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期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

编者的话：厚泽先生离世已逾百日，最初的悲痛过后，我们将面对他留下的遗产。

在他生前，在险恶的官场中，他只能是个失败的政治家，他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个逆向淘汰的体制容不下任何优秀人物。而另一方面，这一失败使他得以彻底摆脱党文化的枷锁和策略性的表述，进一步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不再追求事功转而彻底追求真理。正如李洪林先生所言，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骄傲。失败的政治家造就了成功的思想家。

厚泽先生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他的思想散见于大量的讲稿及与友人的谈话中），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和严整逻辑，也许，待后人整理之后，我们更能看清它的轮廓。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一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正好概括了他的一生。当他问道：“为什么从追求自由民主的门进去，又从文化大革命的窗子里跑出去了”？这一发问既是对自己一生的追问，也是对当代中国的追问。这一追问在历史的一团乱麻中抓住了根本，诸神和偶像在无情的史实和周密的推理中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崩塌。

崩塌的不止是偶像，还有崇拜者们精神家园。这使他们止步不前：年轻时的选择是真诚的，那时的党不是现在的党。正如当时的年轻人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投身革命，当时的党也正如它曾经宣示的，是五四和启蒙精神的合法继承者和发扬者。人们更愿意相信，不是自己当初的选择错了，是党变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党是在什么时候变的？是过早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时候？是背离了曾经许诺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于是，重新恢复这些原则和回到优良的传统就成为一些人当下的选择。毛和斯大林不行了就回到列宁；列宁靠不住了就退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不行了就退回到青年马克思与晚年的恩格斯……他们试图挽救的，不光是这个党，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归属感，那种熟悉的，即使被整肃被抛弃时都没有失去的归属感。

但厚泽先生不同。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抛弃了那种狭隘的归属感，却获得了自由和更开阔的归属感。他不需要为自己的青春辩解。他探索的结果证明，当科学与民主被“科学的学说”与“新民主主义”偷换的时候，当反帝反封建被曲解为一边倒地反西方反传统的时候，现实发生的，就绝非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对它的篡改与背叛。自此，中国脱离了世界共同的文明发展之路，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逻辑的顶点。在这一逻辑中，一切都被颠倒了。观念与实际不再体现为差距，而是截然相反：新即旧，解放即奴役，民主即独裁，社会主义即无社会的主义……一切都走到了反面，犹如辩证法的嘲弄。

逻辑的起点不仅被追溯到五四之后，也被追溯到马克思这一更深远的源头，这一人类文明的批判者和反对者。而结论是中国必须重归人类共同发展的正道，这就是“五个一般”所具有的深意。

为先生百日祭，谨刊发李洪林、吴象先生的追思之作。

朱厚泽的精神财富

李洪林

中宣部从来都是这个党管制全国人民思想的工具。但胡耀邦和朱厚泽当部长时却是例外，他们两人都要把它办成思想解放部。然而大局不变，这种良好愿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两位深得人心的共产党员都是因为不得志于本党，以致抑郁而终。

至今，朱厚泽在部长任内所倡导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仍为人们所乐道。这是朱厚泽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在政治上为受压的思想界争取最大自由空间的策略。作为中宣部长，这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了。

实际上朱厚泽并没有停留在共产党一个领导干部的水平上，也没有满足于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早就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即使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往前走。从他的大量遗稿来看，这位政治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骄傲。只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他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三宽”部长的政治形象。这种理论和政治的脱节现象，正是钳制思想自由的“中国特色”之一。他生前曾经谈到这一点：“很多的文件都是折中的，都是妥协的产物，因为要让大家都能接受，所以文件都具有不彻底性。只要是文件，就是如此。”“思想家的东西只有在他自己的著作里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出他思想的彻底性来。”

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在他未来得及发表的遗稿里，果然表现了这种思想的彻底性。他对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有惊人的见解。

邓小平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但是朱厚泽却在遗稿里，对许多所谓“经典”原理都提出质疑，或者干脆把它推翻。本文仅举数例。

推翻《新民主主义论》

中共党内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好的，如果夺得全国政权以后，一直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国就不会走那样长的弯路了。包括赵紫阳在内，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朱厚泽却超过了他们。他说：

“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

他的理由是：

第一，时代判断错误。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讲，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崩溃了。

第二，领导权的错误。“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无产阶级领导”。这种“领导权”的思想，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朱厚泽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要打问号。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别的劳动，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是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

话。”

第三，革命前途是错误的。毛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朱厚泽说：“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人认为，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朱厚泽指出：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一九四五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至于四九年的建国，“那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

据我所知，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深刻的批判。在此以前，党内左派和右派在毛泽东的问题上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对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却一致肯定，认为他“革命有功”。

邓小平在起草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最关心的不是毛泽东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而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而他之所以能把毛的旗帜再度强加给全党，也就是靠毛“革命有功”，靠“新民主主义论”还能被全党所接受。

如今朱厚泽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根子给刨出来了，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原来毛泽东用来吸引人的“新民主”，乃是骗人的假货。其中“民主”只是手段，只是外壳；那个“新”字才是目的，才是核心。什么是“新”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其实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而这个“党的领导”，也就是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自从一九四三年中共在延安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毛泽东以来，七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天经地义。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中国人民太熟悉了！如果追根溯源，奠定这些灾难的理论基础，正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那个“新”字。朱厚泽第一次把它的外衣揭穿了，这是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解剖“党文化”

作为已经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跳出权力的腐蚀，毅然和“党文化”决裂，并且反过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阳光下解剖给大家看，这是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给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朱厚泽是把它和启蒙作为一组对立物来研究的。“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他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并且批评了周扬把延安整风当作“思想解放运动”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他说：“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以“山之骨”自励的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朱厚泽剖析了滋生这种“党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人是从农村底层来的，这些人知道的党就是帮会。至于现代政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一讲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他认为结党就是干这个的。他怎么知道工业文明社会中的议会民主，政党之类的东西？”他指出：“‘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但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乌七八糟。有的在国民党时期也是令人不齿的东西，竟在共产党那里又死灰复燃。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里面，有的带着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长成了粮食局长，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说明什么？说明农耕文化的宗族、帮会之类的观点在起作用，并通过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发扬光大。”

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虽然今天中共整体的文化素质略有提高，掌权者也终于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是与现代文明不容的“党文化”依然存在，所以朱厚泽说：“改造‘党文化’的难度很大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

既不“社会”也不“民主”

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的朱厚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正因为远离政治，他在理论领域也就可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以免误触政治地雷，也不必披红挂绿，粉墨登场，去讨好官方了。

应当怎样认识当今中国社会？这位“山之骨”的回答真是掷地有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 and 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普适价值——五个一般

朱厚泽不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同时也没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旁边停下脚步。他已经跳出历史唯物论所推演的“五种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归宿概括成“五个一般”，并且用它作为中国的走向。

因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所有的“社会主义”，至今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并未经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已经有过的实践，不论共产党执政还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都陷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泥潭，更不要说政治独裁和思想禁闭又扼杀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所以它们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原苏联在内，全都回过头来重新踏上人类文明的正道了。虽然有几个国家还硬着头皮挂着“社会主义”招牌，那只是为了维护“法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上台的。其实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早就靠资本主义过日子了。这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朱厚泽没有对它多费笔墨，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未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走向，朱厚泽根本没提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五个一般”：

-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 第二，民主法制国家一般，
- 第三，公民社会一般，
-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一般，
- 第五，当代人文精神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

这五个“一般”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达到这“五个一般”的过程。这“五个一般”是不是已经准确地概括了现代文明，当然还可以研究，另外，每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路程，也都会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总是共同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朱厚泽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句话就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实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包括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从来无人涉及，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没有任何人达到这个高度。

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其实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其中有改良，有革命，有和平演变，有武装斗争。从社会发展方向来说，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或者某个方面有进步，而另一些方面在倒退。一般说来，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总是或快或慢在进步，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却是有进也有退。尤其是中国政治，一百多年来，在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所以总是反复无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用强力勉强维持一种高压下的“稳定”而已。其实这种“稳定”，只是在给更猛烈的爆发积累能量，当然谈不上“和谐”。这种“中国特色”，如果用“五个一般”来衡量一下，只有“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两条，多少还有些共同之处。而“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和“当代人文精神”这三条，就很难找到什么共同的东西了。所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距离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

朱厚泽是共产党内的异数。所以这个党容不下他，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参加革命的初衷，

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始终关心国家命运，虽然被丢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二十年，但他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即便坐在冷板凳上，仍然为国家的前途煞费苦心。他始终不渝地盼望中国能真正开始全面改革，尽快和平地转变为宪政民主国家，早日进入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殿堂。

然而现实却使他失望：“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要实现真正的转变，我不持乐观态度。原因是它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还特别受到利益的干扰。”

在这里，他又表现出政治家的明智和“三宽”胸怀：“我们不是主张越乱越好的，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没好处。”“我们不主张推翻重来。但是，要改良，要改革，必须是领导要接受群众的要求，要响应社会内外的要求，如果领导人不接受，改良改什么啊？”

据他估计，“在内外压力下，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不会没有改变，这些改变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是欢迎的。”他担心的是：当政者“由于利益的制约，如果始终跳不出来，那么这种改变，常常会落在整个形势的后边。这样就会进一步促使矛盾的激化，而且还可能酿成新的事件。”然而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社会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就只能酿成暴力革命，整个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朱厚泽说：“我们是促进派，即促进社会的变革，我们都是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家，解决制度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求在一天内完成，也不是要求一句话，也不是说让政府散了架不管就行了，而是要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底线，是真正实现宪政民主。不过他很清楚：“从根本上要解决一党专政的体制。现在我还看不到这个前景。而不从根本上转变，矛盾就很难解决。”

他对中国的前途，可以说有信心也有担心，有决心也有耐心。万恶的病魔在朱厚泽最后的时日里，对这位终生宽厚待人的长者进行了可怕的折磨。他就是带着这些未了的心情，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和朱厚泽没有共过事。他出掌中宣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不过彼此都知道名字，算是“神交”吧。后来有些见面的机会，相聚的时间也不长。我原来对他的了解，也就限于“三宽”。

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发现他有许多遗作。原来他在精神上如此富有，在思想上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不单跳出了毛泽东的樊笼，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框架。实在难能可贵！可惜这些著作面世太晚了，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它的作者已经永远离开人间，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为寻求真理而切磋琢磨了。这真是思想界的悲哀！

不朽的“三宽”

——悼朱厚泽 吴 象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朱厚泽担任宣传部长，半年几乎无声无息，没有吭气。到1985年底连胡耀邦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找他去问，厚泽回答：“听到的反映是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不吭不哈的是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那就逐步地放开一点嘛。”后来，又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捎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点干嘛！”

但他想，如果把我的观点和盘托出，整理成报告，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反而可能引起大的争论，对大局的稳定不利。但他又想老是鸦雀无声也不行，不如东说一点，西说一点，

微微风，毛毛雨，慢慢来，努力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说纷纭中择善而从。”

1986年3月8日，朱厚泽在音协饭厅里用聊天方式讲了一次，提到了“宽松”。

第二天，3月9日，他应邀参加出版家协会代表大会，原来不准备讲话，大家说不行，我们坐好了就是要听你讲话，实在推辞不掉，只好又讲了一次，比前一天范围“宽”，涉及到“宽容”、“宽厚”。

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开全国记者会，又把他邀请去，热烈鼓掌要求他讲话，结果又讲了一次，讲得比前两次更多了一点。杜导正用录音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稿给他，他改后就扣下了，连内部也不让发。

1986年7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才把“三宽”连在一起发表了正式讲话。他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却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走向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与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容、宽厚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著名的“三宽”讲话就是如此，普普通通，并不神秘。第一次在音协那次讲话，后来《文艺报》竟登在头版，有些文艺家下乡也传达，多方面反映强烈，惊动了书记处的人，反应最强烈的是谁？万里。他非常赞成，有次书记处开会还指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他们都赞成，反对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次是全国性的会议，又是把“三宽”连在一起说，言简意赅，通俗深刻。散会不久，“三宽”精神已传遍了神州大地。真是不鸣则己，一鸣惊人。

“三宽”意味着什么？

1986年党中央准备在秋天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是继农业方面五个1号文件、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又一个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措施。耀邦亲自主持，厚泽积极参与起草工作，不断思索如何围绕这个全局性问题做好宣传部的服务工作，主要是沟通上下，把下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当时国内形势平稳，但高层一些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有些人前一段想搞“反精神污染”。因为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只好草草收场。他们又在酝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想把已经有所松动的思想垄断重新收紧。他们要的是“三紧”、“三严”，但不便明说。“三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可以说是全面改革迈出大步前一支小巧、精悍、敏捷的轻骑队。由于厚泽的思虑缜密、方式适当，“三宽”精神得以波澜不惊地出台，迅速传遍了全国。但是，“三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什么深远的意义？似乎还有待探讨。

厚泽逝世后，我想到几点粗浅看法，现提出供批评、商榷。

一、“三宽”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确切、突出、全面、完整的体现。家庭联产承包创造出出人意料的奇迹，长期压在全国上下心头的温饱问题已初步解决。亿万人民几年来亲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猛不可挡。另一方面，僵化、半僵化思想势力还很大。“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解除，“兴无灭资”口号还普遍存在，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冲突，不利于改革大局。中央的文件、决议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工程，当然重要，但这不是短期间可以做成的，更不是短期间可以贯彻见效的。而“三宽”只有三句话，好懂好记，提纲挈领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关键：解放思想，强调冷静、科学。转型时期不同观点的矛盾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不行，采取宽容态度，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第二，强调以人为本，用宽厚直接呼唤人们内心善良的感情，以宽厚的善意化解误会、化解恩怨、化解敌意，问题的另一半就更好解决了。第三，强调党要改造、提高自己，创造宽松的环境空气，发扬民主才能领导好改革开放大业，也就是说，不能以权压人，以势欺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这些不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么？但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成为体系。确实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精神，这也可成为改革开放内在动力不竭的源泉。

二，“三宽”是“双百”方针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厚泽讲话第一句就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强调了这条“之”字型的路曲折而又相连，这是颇有深意的。“双百”方针虽然由于整个国家环境、局势的大变化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不能因此抹煞它是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正确方针。中国没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但“双百”方针使人回忆起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回忆起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回忆起唐宋各代各类文学繁荣兴盛、争奇斗艳的局面。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稳发展。“双百”方针也与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其渊源。现在提出的“三宽”，与“双百”方针内容所指、范围宽窄可能有差别，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继承的。其影响所及，必将汲取民族古老文化传统中积极的精神元素，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发扬光大。过去那个错误的口号“兴无灭资”，积年累月呼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糊涂观念，加重了多少思想混乱。现在的“三宽”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日后必将开花结果，成长为菩提大树。

三，“三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日趋成熟的标志。我已臻望九之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大多崇尚革命，鄙弃改良。总认为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改良不过是“温吞水”，解决不了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股潮流曾经风靡了全世界，身历了国际、国内的变化，经过冷静反复的反思，才醒悟到战争、暴力首先对人民是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以和平文明取代战争、暴力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各国任何革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后鲜有自觉自愿还政于民的。何况当初马、恩对此就没有讲得很清楚。我党在战争时期倒是有自己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惜后来特别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完全走到了反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提出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能不归功于人们对于文革及这之前革命的深切反思。这次渐进式改革，由于接受历史上诸多的痛苦教训，对传统因素采取分析，坚持了一些好的做法。“三宽”应视为渐进式改革趋向的标志。像杜甫所写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三宽”是一种东方古老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朱厚泽在“三宽”的讲话中最后说：“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三宽”是思想文化的理念、政策，又决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理念、政策，也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理念、政策，而

是一种更高的概括：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无所不包的哲学精神范畴、意境。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当然，世界充满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曾经信奉的斗争哲学，未免太偏激、绝对了，好像矛盾的解决，就只有我吃掉你、我消灭你这一种方式。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岂不更好吗？1979年我到安徽工作，记得万里同志一句话：“‘兴无灭资’这口号遗害无穷，使人变得愚蠢、野蛮，‘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有人相信。这是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换一个字，变成‘兴无学资’就对了，就变成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了。学也不是盲目的一切照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

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接着离开了中宣部。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泽在简短的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说着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又补了一句：“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台下响起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

中宣部长朱厚泽下台了，一年半不到就下台了，是作为“三宽”部长下台的。当时正是胡耀邦主持制定精神文明决议，把改革全面推向前进、而一些人要往后退，“克服软弱涣散”、收紧意识形态之际。他不可能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只能另辟蹊径，另创新路，进行鲁迅当年讲的“特殊战斗”。正如韩刚所说：“在特殊的政治格局下，朱厚泽有自己的智慧和策略……终于以特殊的方式宣布他意识形态的主张：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比较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未惹起事端，造成风波。他做到了，《人民日报》1986年8月11日把他的讲话以个人署名文章发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胜利了。

下台至今21年。离开中宣部，无论在农研中心还是总工会，他都受到同事们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高度尊重。几位著名的老学者杜润生、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等，都特别喜欢听他对问题的分析、解剖。1989年离休后，他时间更充裕了，读书思考，行走民间，求知求真，结交年轻人，比在工作岗位上更充实、更紧张、更愉快。他收到太多热情的邀请，几乎应接不暇，每年有200天以上要外出奔忙。他多才多艺，出口成章，兴趣广泛。“三宽”是一种精神理念，是一种人格魅力，是一种谈吐行为，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可以说朱厚泽是“三宽”的化身，无论和朱厚泽说什么问题，都会使人感受到“三宽”精神的启发，“三宽”与朱厚泽浑然一体。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三宽”潜移默化的感染。因此，朱厚泽部长下台了，“三宽”精神却不会下台，因朱部长继续深入民间，到处走动而传播扩散于神州大地，生根发芽，不停息地滋长。

被公认为演说能力超强的朱厚泽，常常是说话最少的一个，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聆听。他“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笔谨慎。他一生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可能不超过20篇。那么多精彩的讲话或未留下纪录或不能以文字形式公诸于世，实在是可痛心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起，原本喜爱美术的朱厚泽开始热衷于摄影，外出时总是“手不释机”。2006年，两位敬仰他的青年摄影家从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中为他精选出版了一本叫《东张西望》的摄影集。令人惊讶的是，照片没有任何图片说明。他的女儿朱玫说：“他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习惯于思想观点充分碰撞。”幸亏这部影集卷首有厚泽同志一篇自我抒怀的短简《山之骨》：“钙（山之骨），世之所珍。至于其人，山村野夫也。出身边陲，远离京华。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沉浮之间，身影偶现，时而入人眼目罢了。野气未

消，钙性难移，但恐所剩无几矣……是的，当那山之骨从溶蚀它的茫茫酸雨、地下潜流，从浩瀚的林莽深处、野草丛里，渗过泥沙与岩缝，历艰辛和曲折——沉积、蒸腾、散发，摒弃了那污烟和瘴气之后，它必将会重新凝结出来。”这是篇难得一见的美文，如果不了解厚泽的为人，他的生活，他的命运，便难以读懂这部具有强烈思想性影集的内涵与艺术真谛。

同厚泽相熟多年的好友顾骧说：“这部影集渗透作者的思想、意志、情愫，是思想家眼中的大千世界。影集里构建的是一部‘天·地·人’的图谱，是对自然、社会、岁月、历史、人生、生命、灵魂具有穿透力的艺术思考，是对人的尊严的尊崇，是对人性、人权、人道的张扬。作者通过精心营造的由构图、画面、光影、色调组成的艺术语言，注入深沉的历史思考与哲理探索，传达出雄浑、博大、凝重的意蕴。在这幅作品面前，我们仿佛听到历史的黄钟大吕之声，眼前浮现出绵延万里的长城，奔流入海的黄河、长江的身影，使人想起祖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民族的苦难与坚强的奋争，想起泽畔行吟的屈子、怒向刀丛的鲁迅，想起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和具有‘山之骨’的特立独行的文化精英，从两千多年前遭‘焚’被‘坑’，至近年代以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探寻、追求，遭受炼狱般的苦难。它映照出千秋痛，它映照出中华魂。在这幅作品面前，我们仿佛读到了作者真诚的灵魂颤动，炽热的激情燃烧。”

我个人认为，上面这一段话并非溢美之词，而是真正对作者的艺术禀赋、文化功底和思想高度的深切理解。

“三宽”的继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那几年国内外的大小风波，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崩溃、东欧变色震惊了整个世界，人心振荡，反应不同，思想陷入混乱，但经济、政治、思想之垄断必须彻底改革却逐渐成为共识。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教训痛苦而深刻。我认为厚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认识在倡导“三宽”时达高峰，“三宽”不仅仅是文化理念、文化政策，而是消除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根本前提、根本手段、根本方针，正如“和而不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主张宽容不同意见在辩论的竞争中取胜。“三宽”是涓涓细流，看似柔弱，但日夜不断，坚持不懈，力量最强，最能以柔克刚，水滴石穿。

1999年，极少发表文章的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近些年来，在多个不同场合朱厚泽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2009年3月，他写了篇纪念耀邦的文章（没有拿出来发表），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行。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行政费大幅增加，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不仅是因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究竟按什么路线搞？是富民的，还是富官的？现在有地方名义上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朱厚泽说：“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有些观

点不少人都说过，但朱厚泽说起来仍有他独到之处。改革 30 周年前后，他常遇到“关于现代化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之类的访谈或座谈。他的回答很简洁：“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2010 年 6 月出版的《炎黄春秋》刊发了《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一文，这是为了纪念 5 月 9 日刚刚逝世的朱厚泽的遗作。一读此文，我立即回忆起 2006 年的一件往事。

这年秋天，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陆子修邀请厚泽和我参加在黄山市召开的年会。这大概是我们先后有二三十次之多相携进行调研活动的最后一次。

回北京前，黄山市委举行了一次二三百人的报告会。这个会是市委和陆子修商量好了再找厚泽和我商量的，辞意恳切，推辞不掉，我们便同意了。那是个下午，礼堂里坐得满满的。市委负责同志致辞后，便请他开讲。他却提出我比他年长，又是家乡，非让我先讲不可。我只好先讲了一段徽文化徽商和徽骆驼精神，只二十分钟便转头请厚泽开讲。他又要推让，陆子修坚决不让，他才开始讲。他接着我的话茬，“黄山市即徽州，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对文化的几点看法。”他先讲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和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农耕文明。他说：“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的生活资料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就到哪里去。只有确立了农耕文明，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内，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农耕社会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有了农耕才重视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几句话就把听众吸引住了。他接着讲，因为农耕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才能建立统一的专制国家，形成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及传统。接着他讲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用“遣唐使”、“丝绸之路”和从西域来的佛教、音乐、舞蹈及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等听众熟悉的事例。他强调指出，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着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极性，而文明的差异、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正因为他为听众布置了这样一个宏大背景，灌输了几个基本概念。所以听众对于近代现代西方文明东来的留下的灾难和屈辱便变为清醒冷静的认识，懂得了对外来物质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对物质背后制度的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不容易接受。从而对全球化、全球化中矛盾及如何应对提高了认识。认识了如何争取双赢；认识到改革后的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的一种新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发芽、壮大的苗圃；可以看出中国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一种现实的制度选择，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摩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讲到这里，全场肃静无声，听众凝神屏息，听他对 20 世纪出现的四大思潮条分缕析。在此之前，我对他常讲的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叠加的特殊局面，已“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听过几次，但没有像这次这样综合贯穿起来讲，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般听众听得更入神。可以说被他完全征服了。此次虽不像发表的文章那样经过反复修改、一再推敲，显得严谨扼要、简明到位，属于原始的形态。正因为如此，是即席发挥，更富有感染力，更显出他的睿智机敏，颇多幽默感，不时引起会心的微笑，或爆发哄堂大笑。结束时更响起热烈持久的掌声。陆子修也很会随机应变，索性把他事前准备的讲稿亮了亮说，印发各位不讲了，专讲听完朱部长讲话后得到的启发，同样得到热烈的掌声，使这个会给当地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亲友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朱厚泽思考的是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受到关注的“中国模式”。他还和从前一样，深入关注现实问题而不轻易下结论。他是改革开放时代

的产物和代表，是一颗珍贵的钻石，晶莹剔透，闪闪发亮。越是阳光不足的地方，越显得光芒四射，璀璨辉煌。